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
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一堂语文课

□ 高洪波

语文课是我从小就格外喜欢的课程，一方面缘于语文老师引人入胜的讲解，另一方面是因为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作文题吸引着我。正是对语文课的喜爱，让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有了写下这篇文章的机缘。

我说的这堂语文课，是去年深秋时节我在深圳参加儿童文学文化交流活动时，陪一群四年级小学生上的一堂课。一位来自黑龙江的优秀教师杨修宝为孩子们讲解四年级语文课本中一篇我写的文章《陀螺》，我有幸被邀请坐在台下倾听。听完课，还有一个对话沙龙，目的是挖掘课文背后的创作故事，这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几年前，我与杨修宝老师在云南有过一面之交，他年轻爽快，能说一口地道的东北话。我的故乡虽然在内蒙古草原，但是从地域文化来说，我们也属于东北文化或者说关东文化，所以我俩是老乡见老乡，且这次见面还是在遥远的深圳的语文课堂上。

我静静地听着杨老师和四年级的小学生们对《陀螺》这篇文章进行解析。杨老师提问，而后和同学们互动，他那幽默的语言把课堂气氛调动得如一场交响音乐会般热烈、活泼。杨老师甚至发现这篇文章里，数词“一”用了35次。这让我很惊讶，说实话，我在写作时从来没有考虑过数词的使用。杨老师还用想象和联想的方式，对这篇课文从主题思想到作者的心理活动，一直到字、词、句如何使用，进行了极有深度的讲解。我坐在下面一边听，一边在心里赞叹，语文老师的确与我们作家大不一样。

在现场的互动环节，主持人让我讲一讲文章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对这堂课的体会。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从生活中挖掘素材，寻找写作的灵感，就仿佛在一条宽阔的河流旁垂钓，我们钓上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仅此而已。这条大鱼被放进了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本里，如何把它烹制成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精神美食，端到学生面前，这就是语文老师所做的工作了。杨老师的这堂课让我看到了一名优秀语文老师精湛的烹饪，课件的准备、演示和资料的搜集、筛选都做得非常好，让人敬佩。”

说到抽陀螺，这是我儿时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写作《陀螺》是几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我记得自己坐在书桌前，开心地写下了一批关于童年的散文。当时我只是想记录童年时代的快乐，包括和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于是写下了《陀螺》。它描写一个孩子对自己的玩具爱不释手的心态，当然还有与小伙伴们在抽陀螺过程中各种欢乐的故事。后来，《陀螺》收入散文集《悄悄话》，紧接着，这本书荣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写《陀螺》的时候，我更是没有想到，它会在若干年后进入小学语文教材。

这样一篇描述童年记忆、个人情感的文章，发表之后成了公共产品。它像一条活泼的鱼，游进了属于它的大海，游啊游，又游到了深圳一所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堂上，成为一场教学观摩活动的主角。

《陀螺》写的是我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留下的记忆，我希望南国深圳的孩子们能体会到一个居住在边塞小城的少年冬日里游戏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正借助于一个个汉字，借助优秀教师的条分缕析和设计精美的课件，呈现给学生们。

我又想到，许多像《陀螺》一样进入语文教材的作品，它们是一代又一代人对中国元素、中国故事的书写，而后借助语文课堂这个平台传递出重要的文化信息。

北方辽阔的草原、南海边的深圳，遥远的童年与活生生的现实，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一起。课堂上，我突然觉得自己也成了小学四年级的一名学生。回到童年的感觉真好！

（摘自2025年2月14日《光明日报》）

恋人

□ 史铁生

八十岁，老吴住进了医院的病危室。一步登天的那间小屋里，一道屏风隔开两张病床，谁料那边床上躺的老太太竟是他的小学同桌。怎么知道的？护士叫到老吴时，就听那边有人一字一喘地问道：“这老爷子，小时候可是上的幸福里三小吗？”老吴说：“您哪位？”“我是布欢儿呀，不记得了？”若非这名字特别，谁还会记得。“五年级时就听说你搬家到外地去了，到底是哪儿呀？”“没有的事”老吴说，“我们家一直都在北京。”屏风那边沉寂半晌，而后一声长叹。

布欢儿只来得及跟老吴说了三件事。一是她从九岁就爱上老吴了。二是她命不好，一辈子连累得好多人都跟着她倒霉。布欢儿感叹说，没想到临了临了，还能亲自把这些事告诉老吴。

哪些事呢？小学毕业，再没见到老吴，布欢儿相信来日方长。中学毕业了，还是没有老吴的消息，不然的话，布欢儿是想跟老吴报考同一所大学的。直到大学毕业，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老吴仍如泥牛入海，布欢儿却是痴心未改，对老吴一往情深。一年年过去，一次次地错过姻缘，布欢儿到了三十岁。偏有个小伙子跟她一样痴情，布欢儿等老吴一年，他就等布欢儿一年。谁料，三十七岁时布欢儿却嫁给了另一个人，只因那人长相酷似老吴——从他少年时的照片上看。“这人，还好吧？”“他就不算个人！”为啥不算个人布欢儿也没说，只是说，否则母亲也不会被气死。

那人之后布欢儿心灰意冷，很快就跟第一时间向她求婚的人登记了。婚后才发现，这人还是长得像老吴——从少年老吴的发展趋势看。“怎么样，你们过得？”“过是过了几年。可后来才知道，咱是二奶！”“这怎么说的！”怎么说？布欢儿一跺脚，离婚，出国，嫁个洋人，再把女儿接出去上学……一晃就是二十年。

有一天接到个电话，是当年那个一直等她的小伙子打来的。“过得还好吗，你？”“还是一个人，我。”“咋还不结婚呢，你？”“第一回我被淘汰。第二回我晚了一步。第三回嘛，这不，刚打听到你住哪儿。”“唉，你这个人家哪！”“我这个人性子慢。你呢，又太急。”约好了来家见面，布欢儿自信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可门一开她还是惊倒在沙发里：进来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小老头儿……

老吴回普通病房之前，拄着拐棍儿到屏风那边去看了看他的同桌。四目相对，布欢儿惊叫道：“老天，他才真是像你呀！”“你是说哪一个？”“等了我一辈子的那个呀……”这是布欢儿告诉老吴的第三件事。

（摘自2012年第1期《收获》）

人性的暖

□ 方言

《梅兰芳自述》记载，画家齐白石还籍籍无名时，在一次堂会上，梅兰芳发现他坐在角落里没人理睬，显得非常窘迫，梅兰芳便迎上去恭恭敬敬地把他搀到前排坐下。大家都非常惊奇，不知这个粗布衣衫的老头子是什么来头。梅兰芳故意提高嗓门向大家介绍，“这是名画家齐白石先生，是我的老师。”为此齐白石非常感动，专门做了一幅《雪中送炭图》赠予梅兰芳，并在上面题了一首诗：“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名利场上，世态存炎凉，人情有冷暖。即便如此，也总有值得我们仰望的人性之暖。

（摘自2025年3月15日《今晚报》）



六尺巷里的韵味

□ 俞 胜

桐城六尺巷，这么一条长不过百米、宽不过两米的小巷，现在已经闻名遐迩。

巷口的太湖石上镌刻着清朝康熙年间任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那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一首诗化干戈为玉帛，轻轻松松地解开了张、吴两家宅基地之争，留下了一段相互礼让、以和为贵的佳话。

六尺巷的故事为什么发生在这里，而没有发生在别处？我常想，这其实是一种必然。一方面，桐城山川灵秀，天地间的灵气与人文智慧在此交汇，形成了当地人的独特气质。用张英的话来说，“端重严格，不近纷华，不逐势利，虽历显仕，登津要，常欲然若韦素者。”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端庄稳重、严谨自律，不追求浮华，不趋炎附势，即使身居高位，也常常谦逊得像普通百姓一样。

桐城人崇尚耕读传家，自古就有“穷不丢书”的传统。张英在家训《聪训斋语》中指出读书为“养心第一妙物”，缺乏坚定心志的人很容易在生活的漩涡中迷失，正如罗盘上的磁铁能使针指向特定方向，读好书能帮助人们放下杂念、找到目标，并从容看待“人间拂意之事”。也就是说，读书能明理，明理就懂得“礼让”“和为贵”。六尺巷东边石碑坊上的“礼让”二字，正承载着张英这首诗的精髓。

另一方面，桐城士人阶层悉心传承先贤的醇厚家风，一言一行皆遵循先辈教诲。上行下效，普通百姓也深受濡染，邻里间守望相助、诚信友善，由此民风淳朴，处处洋溢着温情与良善。

在六尺巷中漫步，我在想，当年吴家的主人一定也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光明磊落，自信有理走遍天下。如果吴家的主人是一个不知诗书、不懂“礼让”“和为贵”的人，在张家让出三尺宅基地后，他就不会觉得心中有愧，甚至可能还洋洋自得，那么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六尺巷。

有形的景致，只不过是条长不过百米的小巷，两边各有一堵斑驳中透着古意的墙。可是站到这条巷子里，你的眼前还会出现一道无形的景致。虽然它在现实时空中无痕无迹，但六尺巷的故事萦绕在你的心头，让你思考谦让与得失的关系。这道无形的景致逐渐生动起来。就像此刻在我眼前，分明出现了300年前的张、吴两家人，他们穿着朴素的衣裳，在这条巷子里你来我往，你送我家一块年糕，我送你家一坛米酒；叔伯爷婶像称呼自家人一样互相称呼着对方……

故事中的张英官居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其子张廷玉官居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是内阁的主要成员，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其职能大体与宰相相当，所以在我们桐城民间，都喜欢亲切地称张英、张廷玉二人为父子宰相。

康熙四十年，张英告老还乡，还乡后的他应该就住在这一六尺巷一侧的祖宅里吧？在桐城，关于这对父子宰相的传说有很多，我特别喜欢其中一个“老宰相题画”的传说——

一天，几个书生在县城的一家茶馆里边品茶边欣赏一幅画：一座村庄沐浴着朝阳，村前有条小河，岸柳成行，桥上走着一名飘然若仙的老道；桥头泊着一条船，一只扬脖欲啼的公鸡立在船头。书生们跃跃欲试，要为此幅画题诗。可吟来吟去，所有的诗都不尽如人意。这时，一个衣着平常、手捧黄铜水烟袋的老头上前笑道：“难矣哉，不难也！”在几个书生轻蔑的目光中，老头饱蘸笔墨，一挥而就一首诗，落款为“桐城张英”。在桐城，张英的名字自然如雷贯耳，书生们大吃一惊，赶忙赠礼道歉。张英笑而勉之。

传说中的张英就像邻家大爷一般慈祥，他曾经身居高位，致仕后以平民自居，传说中他衣着朴素，与他所说的“常欲然若韦素者”一致。书生们品茶吟诗与桐城文风盛行一致，这个传说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这个传说也告诉人们不能以貌取人，告诉人们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传说中氤氲出来的气息，不就与六尺巷中飘散出来的韵味息息相通吗？

（摘自2025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天下畸人癖爱山

□ 陈春成

晚明尚癖。我有一偏见，觉得魏晋人的癖，多有对礼教、对政局的逃避或逆反，故常有不近人情处，如嗜食痴、食臭虫、听驴鸣等，表演性较多。至晚明，人的癖更纯粹些，就是喜欢，溺于所爱。张岱所嗜极多，曾说：“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汤宾尹说：“士患无癖耳。诚有癖，则神有所特寄。”袁宏道在信中对友人劈面一问：“髯公近日作诗否？若不作诗，何以过活这寂寞日子？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弈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甚么铁床铜柱、刀山剑树也，可怜，可怜！”每读此信，就觉胸中畅快，琐屑的烦闷为之一扫。

偶读《徐霞客游记》，是几年前在武夷山，忽然好奇徐霞客当年是如何游武夷的，就搜了书来读。书常为其名所掩，《徐霞客游记》是一例。从小听此书名听得熟了，没看过也当看过了，从未动念想翻。一看觉得很不一样。惊异于他不剪裁，不经营，如长镜头到底。常常是：连雨，困于某处；草鞋磨破，无法走路；买不到新草鞋，又耽擱一日；欲探一洞，手头却无松明，只好等取来再探；同行的仆人生病，又耽擱数日。琐事与奇遇相错综，不可预料，没有铺垫，就被裹挟走着。看钱谦益为徐霞客写的墓志铭，里面夸赞徐的文字，“如丹青之画，如甲乙之簿，虽才笔之士，无以加也”，又在书信中向友人推崇徐：“多载米盐琐屑，如甲乙账簿，此所以为世间真文字。”所谓甲乙账簿，就是老师常批的流水账，若未读过《游记》原文会觉得讶异，还有这样夸人的？潘耒也说，他读徐霞客，“不服其阔远，而服其精详”，与钱同理。正是因为其游踪阔远，材料磅礴，可以不事雕琢剪裁，就以琐屑和精详示人。《白鲸》的迷人处也在于此，狂热是其推动力，贯穿那些不厌其烦的航海细节（这些细节也劝退了不少人）。袁宏道的游记是可把玩的，闲时品读一则令人惬意；《徐霞客游记》则是连绵一气的，把人浸在里面。

历代评徐霞客，最全面的当属晚清的李慈铭，这位以毒舌著称的书评人，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将徐狠批了一通。有趣的是，现在看来，他所列举的《徐霞客游记》的诸般弊病，竟全是优点，几乎点出了此书动人和传世的原因。他先说徐霞客“梯险纡虚，身试不测”，“古人癖嗜烟霞，当不如此”，即指徐常以身试险，逢岩则攀，逢洞必钻，古之高士寄情山水，从容赏会，没有他这么玩的。徐霞客用绳子将自己吊下山崖或在岩穴中匍匐而行的所见所感，是这位老先生在书斋里怎么也想象不出。又说徐“按日实书道里南北，同于甲乙账簿，无所文饰”，他所贬的恰是钱谦益所赞的；又批徐“笔舌冗漫，叙次疏拙，致令异境失奇，丽区掩采”，我却觉得徐的好处之一正是他不大惊小怪，动辄抒情，写景的笔墨恰当，时有清丽的片段，实在看不出文墨差在哪。钱谦益的人品有亏，才学是名冠一时的，也说徐文“虽才笔之士，无以加也”。这一处只能说是各花入各眼。接着李慈铭说徐写山时，多注意山的脉络向背，简直像看风水的术士，尤其无聊。这反倒显出李的见识局限，有些自取其辱了。后世推徐霞客为中国地理奠基祖，那是夸大了，但徐对山川地物非止观赏，确已有考察的成分。他平素即留意收集方志和前人游记。探究山脉走向，在当时似仍是奇怪的趣味，徐在旅途的终点，就遇到一位落第书生史君，畅谈一夜，史君说他平生就爱搜访山脉，总被嘲笑，不敢和人说，不料邂逅徐霞客，一聊之下，真是痛快。

如果说徐早年的游，是以怡情为务，最后一次的出游则有舍身的决绝。五十岁后他觉得老病将至，再拖延下去，以后断无机会远游，他是和家人朋友诀别后出发的。在云南时，遇到一个苏州人，正要派仆人回乡送信，徐霞客家在江阴，可顺便帮他带信。徐霞客谢绝了，他想自己离乡数年，家人大概以为他死了，若写信报个平安，等信寄到已是数月之后，没准那时自己真死了，又何必寄信呢——但他犹豫一晚上，还是写了信。

多年前有学者指出，徐霞客在广西蹭用官方的驿传系统，支使村民抬轿搬行李，甚至令村妇代担，隔些年就被人翻出批判。那确是实情。徐不是一个道德上无瑕疵的人，私生活也有失（与婢女有私生子，即后来为他收集轶稿的李寄），按老话说，他本是“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就是足不出户，每日行乐如张岱，也是坐享剥削的成果。用现代标准审判古人，自然是无往而不利。其实明代的江南富户，还保留奴隶制，所养的家奴是世代为奴的，徐霞客的同行者顺行即徐家的家奴。就家奴的日常工作而言，他算摊上了苦差事，万里远征，徐霞客是抱了死志的，自然顺行得以死相随，攀山探洞多半有份，除非留在山下看行李。他在云南终于挨不住，偷了财物逃跑了。徐霞客没有派人去追，只是慨叹，知道自己是个强人所难。后来顺行应该是辗转回到了徐家，据《游记》的整理者季梦良记载，在徐霞客病逝后，他曾向顺行询问游记中缺失的事迹。明末江南奴变，徐家几乎被起事的家奴灭门，不知顺行是否在其中。

我尤其留意的是徐霞客的最后半年。他在云南双足残废，被丽江土司派人送回江阴，约半年后去世。其间他以怎样的一种心境卧床等死？想到丁尼生的《尤利西斯》，垂暮的英雄困于岛国，听海的喧响，体味着“我已变成一个名字”，他呼唤同伴们再度乘船远游，“虽然我们已无摇天撼地的伟力”。而对于徐霞客，一切是真的结束了，平生知交也零落（他死前听说好友黄道周被下狱，痛心不已），只剩下嵯峨连绵的回忆和手中持有的一小部分山——他带回的石头。他是否像凝视风景一样凝视过自我？

（摘自《收获》公众号）